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热点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及其实践研究

The Grand Strategic Idea and Its Practice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胡 键◎著



时事出版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热点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及其实践研究

The Grand Strategic Idea and Its Practice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胡 键◎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其实践研究/胡键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80232-905-8

I. ①—… II. ①胡…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合作—
研究—中国 IV. ①F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3031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30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前 言 |

本书是基于笔者在社会上讲课的内容形成的。自2013年9月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后，不仅各高校、党校在学习，而且社会各层面都希望对此予以了解和领会。尤其是一些省市希望努力抓住“一带一路”的机会以实现经济的跨越，也邀请笔者前往讲课。因此，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笔者应邀到十多所高校、党校，以及部队、党政机关专门讲“一带一路”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专题的讲稿，而后每讲一次又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这本书的内容。由于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严格来说，它不是一本研究性专著，而是一本整合性专著，并且可能存在一些不够严谨的地方，特别是在参阅资料的时候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笔者一直强调学术规范，但由于是热点问题，加之受讲课时效性的制约，本书不同于笔者一贯的做法，希望读者用宽容之心予以谅解。

虽然本书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探讨的“一带一路”对笔者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相反，笔者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关注和研究。“一带一路”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面向亚欧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面向东部沿海途经东南亚、南亚以及环印度洋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区域无疑是中亚地区。笔者过去长期研究中亚问题，包括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中亚的对外关系，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亚问题的论文，应该说这是形成本书最重要的基础。2007年，第二届

“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举行，其主题就是“新丝绸之路与和谐社会”，来自中亚、俄罗斯、美国、欧盟和中国的专家学者、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以及各国媒体人士共 500 多人见证了这次国际盛会。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国领导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其他国家也有政府要员参会。由此可见，各国都十分关注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本次论坛的成果最后形成了一本论文集，这可以说是关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最早、最全面的成果，其内容涵盖了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非传统安全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中亚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大陆桥经济问题的研究，因为第二亚欧大陆桥从中国连云港经陇海线、兰新线，穿过中哈边界进入中亚地区，最后到达荷兰的鹿特丹。但是，这条大陆桥却长期受制于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特别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影响，以及中亚各国政局的影响而难以发挥其正常的功效。这是从事中亚问题研究而对第二亚欧大陆桥问题的一种观感。但不管怎样，中国经济发展不仅要加强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建设，而且需要寻找“走出去”的更多通道。2007 年，应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邀请，笔者参加了“第三亚欧大陆桥”的可行性论证，并作为评审组组长提出了不少想法。尽管关于“第三亚欧大陆桥”当时只是一个设想，但它至少拓展了中国“走出去”的视野。结合云南省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中印缅孟经济合作”的设想来看，实际上，这一系列的设想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此基础上，2013 年李克强总理在与印度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了“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倡议，得到了相关国家的高度认同。2015 年 9 月，笔者应西双版纳州政府的邀请去讲授“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相关内容，随后考察了西双版纳州的产业、交通、口岸等情况，这种直观印象为进一步完善本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另外，2010 年，在新疆“7·5”事件一周年之际，笔者到新疆进行考察，从乌鲁木齐开车经巴音布鲁克草原、库车、库尔勒、和田、喀什，最后到达塔什库尔干中巴边界上的红旗拉甫山口，对南疆的人文、经济进行了考察，对中巴公路沿线以及中巴合作的情况也有了直观的认识。这些考察对后来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认识非常有价值。

总之，本书是基于既有研究而写成的，并非一时之兴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之后，言之者可谓众矣，然而真正在研究其内涵的却为数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把“一带一路”作为一顶帽子在使用，而没有进行直接涉及其实质性内容的研究。这样会导致“一带一路”成为一种口号，从而降低它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本书则是关于“一带一路”的综合性研究，虽不全面，但却直面其内容。不管怎样，对于想了解“一带一路”内容的学者和政府决策者而言，本书还是有一定现实参考价值的。



2015年9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背景 _1

-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论渊源 _1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内部原因 _14
- 第三节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外部环境 _19

第二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主要内容 _33

- 第一节 关于“一带一路”内涵的争论 _33
- 第二节 “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互联互通 _37
- 第三节 中国城市群的战略布局 _42

第三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外交转型 _45

- 第一节 中国外交转型 _46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 _57
- 第三节 中国重塑亚洲地缘结构的战略路径 _65

第四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高科技外交 _80

- 第一节 科技重塑当今国际关系 _80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高铁外交” _82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核电外交” _85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北斗外交” _88

第五节 高科技外交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_96

第六节 加强高科技外交的政策建议 _100

第五章 “一带一路”推进中战略核心国的选择 _104

第一节 核心区域与核心国的选择 _104

第二节 核心国对推进“一带一路”的机遇与风险 _105

第三节 印巴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对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_111

第六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文化交流 _115

第一节 “一带一路”建设为什么要强调文化交流 _116

第二节 “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主要文化交流项目 _118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支撑 _121

第七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国际经济走廊 _124

第一节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 _124

第二节 中巴经济走廊 _130

第三节 中蒙俄经济走廊 _138

第八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非传统安全治理 _143

第一节 中亚:“心脏地带”为何长期处于现代化边缘 _143

第二节 中亚地区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 _145

第三节 中亚非传统安全威胁产生的根源 _151

第四节 构筑维护中国西部安全的多边合作机制 _154

第九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海洋战略 _159

第一节 中国为什么需要海洋战略 _160

第二节 南海为什么成为问题 _165

第三节 南海危机管理要有新模式 _171

第四节 南海危机合作管理的制约性因素 _179

第十章 “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风险 _185

第一节 沿线国家的政治局势 _185

第二节 传统地缘政治争夺 _194

第三节 非传统因素引发的政治风险 _204

参考文献 _208

后记 _216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提出来的战略设想，但绝非突发奇想，也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的理念渊源的。其中的理念渊源远的历史不说，我们可以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中找到其历史脉络，尤其是其与中俄传统文化和十八大的外交思想还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论渊源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改革开放外交实践的最新发展。从理论上来看，它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直接就是中国当代外交实践的理论抽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中国外交思想的具体化。

一、与“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渊源

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长达 7500 多公里共同边界，曾多次发生正面冲突。1989 年 5 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正式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1989 年 11 月，中苏双方开始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问题进行谈判。1991 年

12月苏联解体后，中国与苏联的边界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相应地，原先中苏双方一对一的边界谈判转为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吉、塔四国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谈判。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五国领导人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机制，并且由五国两方变为五国五方，讨论更广泛的合作问题。“上海五国”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起来的。

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哈、吉、塔的境界问题谈判非常艰难，但是从1992年3月开始，五国两方延续了1989年11月的中苏两国边境裁军谈判。到1995年12月，五国两方进行了22轮谈判，最后就中国与上述四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因此，经五国的共同努力，1996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就是“上海五国”的雏形。根据协定，五国两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这个协定使中俄、中哈、中吉、中塔边界在成为和平友好境界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97年4月24—25日，五国两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与俄、哈、吉、塔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人员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的最高数额；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由于五国会晤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五国领导人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机制，由五国两方变为五国五方，讨论更广泛的合作问题。《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

军事力量的协定》与《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一起，为后来中国与四国在双边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开始边界问题谈判的同时，军事上的互信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当然，这种互信机制首先是在有关各国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独立后，中国作为其最大的邻国立即予以承认，并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国家间关系标准，而是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以及遵守国际法则的基本精神来指导两国间的新型关系。当然，这种政治上的互信也建立在两国友好的历史渊源之上。军事互信机制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更是世界各国的时代主旋律，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求合作、谋发展。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都面临着内部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本地区尽管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没有理由不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从1996年开始，“上海五国”元首每年会晤一次，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五国加强打击日益泛滥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实力。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宗教纷争和民族冲突不断，而这一切又与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相联系，从而使该地区各国的极端势力联成一体，形成了一股跨国的恐怖主义势力，严重危害着中亚地区各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一开始就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98年7月，五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第三次会晤，共同签署了《阿拉木图联合声明》。五国一致表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并把“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的原则首次写入会晤的联合公报。1999年8月，五国元首第四次会晤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并发表了《比什凯克联合声明》。声明首次指出：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毒品走私、武器贩运是影响本地区各国稳定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决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遏制三股恶势力以及毒品、武器走私等犯罪活动，并推动五国执法安全部门的合作。这次会议之后，五

国执法安全部门领导人和国防部长相继召开了三次实质性会议，讨论了建立军事安全以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机制的具体问题。2000年7月，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晤，各方重申联合打击三股恶势力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为此，五国商定，将签署多边合作条约与协定，五国边防、海关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酌情在五国框架内联合举行反恐怖和反暴力活动的演习，就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并就构筑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与和平合作大厦达成广泛的共识。

在这里不得不提哈萨克斯坦。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12月独立。独立后不到一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在1992年10月的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倡议，旨在通过各国专家、学者和领导人之间“讨论亚洲或欧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促进亚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协商，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的认识，消弭相互间的误解、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并建议将这个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英文缩写为CICA）。1993年2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再一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同时将推动这一构想实施的方案进一步细化。1992—1995年，亚洲各国专家、学者、外交官进行了广泛研讨，就亚洲地区整体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进行充分酝酿，初步制订了亚洲安全合作的阶段性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亚信”国际会议。1995—1998年，亚洲国家较高级别领导人参加的多边安全合作会议召开，讨论仿照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方式建立全亚洲安全合作机构的可能性。1999年8月，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得到“上海五国”比什凯克元首会晤的认可，其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各方高度重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进程……”这是关于在亚洲建立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倡议。另外，1998年，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提出“丝路外交战略”，倡导把

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地区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桥梁。他的倡议也在比什凯克的“上海五国”元首会议上获得认可，声明指出：“各方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关于在当代国际合作中复兴丝绸之路的‘丝路外交’构想，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

虽然，“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和纳扎尔巴耶夫、阿卡耶夫的倡议不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原因，但是其都主张建立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一点上，其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况且，中国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中本就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其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体现。所以说，“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上述观念有重要的渊源。正如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特地选择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用创新合作的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没有原因的。

二、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渊源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五国”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试图借用地区多边组织来重塑欧亚地区秩序。诚然，上述各种倡议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多年来对促进欧亚地区的合作与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欧亚地区仍然存在着各种障碍，如各种亚政治力量、相互不信任的认知导致的猜疑等，都严重阻碍着上述倡议和机构对欧亚地区秩序发挥重塑的功能，以至于欧亚地区秩序碎片化的趋势仍然存在。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并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原来的“上海五国”已顺利地实现了功能转换，即从解决边界的功能转向反恐的功能。这一公约第一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做了法律上的界定，为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

从五国会晤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以反恐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经历了发展、成长最后到机制化的过程，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

国际反恐组织。作为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特点。

首先，上海合作组织是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效应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给世界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扩大了世界性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增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脆弱性，以及引发一些国家内部的危机和动乱，促使一些犯罪活动的国际化与恐怖主义的全球网络化等。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而地区组织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次，是地区治理的具体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主要任务，兼及打击毒品买卖、武器走私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在治理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上海合作组织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精神，在组织内部没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国，其中既有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有其他四个小国，但在组织原则和机制中，内部不存在任何大小国家区别对待的不平等关系，而是成员国一律平等的多边协商合作机制。这与传统国际组织通行的“大国原则”完全不一样。从这些原则精神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可以说是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方面在本地区的一种尝试。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主张一种摒弃“冷战思维”的新安全观。1997年4月中俄两国签署《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了这种新的安全观。后来，这种新安全观逐渐得到“上海五国”各成员国的认同，其精神最后被渗透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各项机制中。所以，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等概念为基本架构与基础的安全理念，构成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文件的核心思想。正是这种安全理念使上海合作组织无论是处理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机制都得到了逐步完善。^①

第四，上海合作组织逐渐淡化军事色彩而强化反恐力度，这表明该

^① 俞晓秋等：《非传统安全论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第48页。

组织完全不同于传统国际政府组织的功能。结盟性的组织毫无疑问是针对第三方的，即使非结盟性的军事组织也往往使该组织外的某些国家产生忧虑，从而对该组织增加几分戒备之心。而上海合作组织不仅不会使组织外的国家产生戒备，相反，组织外的一些国家觉得在反恐等问题上与该组织有共同利益，所以要么以非成员国的身份加强与该组织进行合作，要么加入该组织以更好地应对全球问题。^① 这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非对抗性的、非排他性的区域合作组织，它时刻准备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密切配合以根除恐怖主义给全世界带来的威胁。

“一带一路”战略设想的目的是通过经济手段来促进欧亚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构建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的“上海精神”所体现的新安全观、新型的国家间关系、新型的合作模式，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三、与十八大外交思想的渊源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句话不仅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指针，更体现了当今世界事实上已经越来越突出的国际社会的共生现象。当今世界既不同于中世纪到近代历史的社会体系，也不同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从时间顺序来看大致包括：

第一，世界从两大阵营的冷战分裂转变为冷战后的大国合作。在冷战时期，两大超级大国挟持着各自的盟友进行争夺，使世界成为一个核桃的两瓣。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国家间的冲突频次可能比冷战时期更多，但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的冲突和小国之间的战争；而且，这些冲突基本上

^① 前者如美国在“9·11”事件后就主动要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反恐方面加强合作；后者如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因感到自己国家的确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威胁而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都伴随着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全球化的负面问题。大国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没有发展成为直接的武力冲突，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对抗也都在理性和可控的范围内，在双方或多方的协调下，大国之间很快又走上合作的轨道。即便是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危机，各大国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都能走上理性的谈判桌。因此，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已经进入一个合作的长周期，至少冷战结束 20 多年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

第二，世界从冷战初期形式上的合作到当今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在冷战结束初期，大国之间的合作基本上还是在形式上，缺少实质性的内容。主要是因为相互间的隔阂并没有立刻消除，而且双方主要的成员在欧亚大陆上继续保持着地缘博弈的态势，特别是要消化苏联解体后的诸多问题，因此双方有合作但更多的仍然是竞争。然而，随着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主权国家市场的不断开放，各主权国家的利益通过市场的方式越来越密切地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交织、叠加和一致性，因此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度就越来越高。

第三，世界从利益依存到命运攸关。随着传统安全问题的逐渐退潮，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利益的最大危害，例如环境保护、气候问题、技术异化问题（黑客）、恐怖主义、重大灾难的应对问题（如地震、海啸、核危机、生化危机、流行性疾病）等。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跨国性、不可预测性，虽然在某个国家发生，但如果不及时治理就会很快遍及其他国家乃至更大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之下，相互依存的利益各方就成为命运攸关方。全球问题要求全球进行跨国治理、合作治理和综合治理。

各方成为命运攸关方是因为各方都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共同的安全利益等，而这些利益在全球问题的威胁之下处于不安全状态。保护共同利益不受威胁的前提就是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而何谓命运共同体意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人类共同体意识至少应包括：

第一，摒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毫无疑问，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国家利益始终要放在首位，但在当今世界，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构建全球治理机制的最大束缚。因为，狭隘的国家利益纵容民族主义情绪，而民